

# 周作人与北京\*

洪峻熤\*\*

## <目次>

- 一. 前言
- 二. 作為批評對象的北京
- 三. 從民俗學的角度看北京
- 四. 作為文人生活的北京
- 五. 小結

## 一. 前言

1937年7月7日，震惊东亚以及世界的卢沟桥事件发生，中日全面开展，紧接着7月29日北平沦陷，随着北京、清华等高校宣布南迁，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而周作人却决定留北平，守“苦雨斋”。至于他为什么选择“苦主”北平，则尽管他自己后来对友人说“当时家庭的牵累太多”，“无法搬下去”等理由，<sup>1)</sup>不能完全认同这个自我陈述，这也只能看做其中的原因之一。当然，也很难想象他一开始就将当“汉奸”的打算考虑在内。可我倒觉得更值得倾听的是，郑振铎对周作人的当时情景所说的下面这么一番话。他说：

“七七”以后，我们南方的朋友们都十分关心着他，许多人都劝他南下。他说，他怕鲁迅的“党徒”会对他不利，所以不能来。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托词。其实，他是恋恋于北京的生活，舍不得八道湾的舒适异常的起居，所以不肯搬动。<sup>2)</sup>

\* 本論文是中國文化研究學會于2009年11月28日在淑明女子大學舉辦的2009年中國文化研究學會國際學術大會上發表并進行修改補充的。

\*\* 同德女子大學校 中語中國學科 助教授, hongjh@dongduk.ac.kr

1) 致徐誥的信 (1966年) 《知堂書信》，華夏出版社，1995，p.422.

2) 郑振铎《惜周作人》，《周作人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p.141.

这里所说的“舒适异常的起居”当然不会仅仅指物质方面的，同时也包括以“八道湾”为代表的北京生活的某些文化、学术风土的层面，更包括一座古老的城市所能赋予的某种氛围。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南方出身的文化人住北京的时间实在太长，跟北京的关系也很密切。周作人在1917年应蔡元培之邀来北京定住以后，除了去短期的日本和偶尔的一些外出之外，他将近50年基本不离开北京。甚至他后来因汉奸罪而在南京入狱2年半，释放后，逗留半年上海之后也仍然回到北京，一直生活到死。<sup>3)</sup>可以说，他的整个生命都伴随着与北京：他一生的荣誉，奔波、苦闷、彷徨也都与北京密不可分。

其实，他早在1927年也有过一次离开北京的机会。当时，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北京政府为了镇压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下达通缉令，其名单上也有鲁迅、周作人的名字。由于当时形式非常严峻，很多北京的文人学者都纷纷南下，包括其兄鲁迅在内。周作人也曾一度有过这么个打算，林语堂曾劝过周作人去厦门，可他最后没有去，决定留在北京。<sup>4)</sup>

我在这篇文章中并不准备专门讨论周作人当时这种选择的原因，而只是想探究的是，对于周作人，北京对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对北京为什么总是这么恋恋不舍？同时也想了解他怎样看北京、如何对待北京。而周作人对他弟子的“北京”所说的下面这段话，或许对我们了解“周作人的北京”提供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司徒君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他性喜作画，据他的朋友说，他作画比吃饭还要紧。他自己说，他所以这样的话，自有他不得不画的苦衷，这便因为他不能闭着眼睛走路。我们在路上看见了什么，回来就想对朋友说说，他也就忍不住要把它画出来。我是全然不懂得画的，但他作画的这动机我觉得还能了解，因为这与我们写文章是一致的。司徒君画里的人物大抵是些乞丐，驴夫和老头子，这是因为他眼中的北京是这样，虽然北京此外或者还有别的好东西，大家以为好的物与人。<sup>5)</sup>

3) 1945年12月6日，周作人因汉奸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先关在北平炮局胡同的监狱，后来至1946年5月，他被解送南京，关押于老虎桥监狱，一直到1949年。1949年1月出狱。出狱后去上海暂住7个月，到1949年8月，周作人重新回去北京。

4) 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p.278。

5)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周作人自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p.602。（以下引周作人文集，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周作人自编文集》）

司徒乔是周作人在燕京大学教书时弟子，是画家。上文是曾一次周作人为弟子的画展所写的一篇“小引”。在这里，他认为，司徒乔作画的动机和角度跟他自己的写作一样，即注重自己的感受和理解，不太在乎世间的普遍看法，而具体涉及到北京时，周作人强调“他眼中的北京”。由此我们可以期待“周作人眼中的北京”也会非同一般，作为将近50多年一直不离开此地的“半北京人”，至少他肯定会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和理解。

## 二. 作为批评对象的北京

翻开周作人的文章，涉及到北京的或以北京为背景的可以说不少。可似乎有些意外的是，他对北京直接表示好意或亲密感的文章却很少，反而更多的是对一些现实北京种种时弊的批判和微词，在这里，北京经常被成为他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对象。尤其突出的是，对民国以来北京市政的一些批判。

1919年，周作人在北京前门大街上碰到了一群兵警马队追赶学生的场面，这一次经验让他一生难忘。对此，他感到非常震惊，说：“我从前在外国走路，也不曾受过兵警的呵叱驱逐，至于性命交关的追赶，更是没有遇着。如今在本国的首都，却吃了这一大惊吓，这出人意表之外，所以不免大惊小怪，写了这许多话”<sup>6)</sup>。当时的北京成为民国的首都已将近10年，可整个城市的市政、公共设备、市民意识不够完善。而一些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北京感到的第一印象就是对城市基础设施的缺乏和市民意识的全面落后。<sup>7)</sup>当时的北京作为800年的古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可其现代化市政和公共设施而言，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周作人也不例外。他曾在东京生活过6年，熟悉作为一个现代化城市要具备的各种条件，对比之下，自然不能不感到缺憾。他看到1920年代北京的“拆墙”，对其城市规划过程中的“武断”和由此导致的民众生活的“惨不忍睹”，感到非常愤怒<sup>8)</sup>。而尤其痛心的是，在北京城的各个建筑和街

6) 周作人《前门遇马队记》，《谈虎集》，p.11.

7) 董玥，《国家视角与本土文化—民国文学中的北京》，陈平原、王德威 编《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pp.240-242.

市上随处能够看到的北京人在审美意识上的“俗恶”：

我平常走过天安门，望见红墙上钉着的这七个大字（引者注：“京师慈善联合会”），总感到一种不愉快。毕竟那个联合会救济了京师的什么，这且不管，即使他真救了许多人民出于水火，那也只是普通的一个慈善机关，只消挂一块小招牌就了事，何必学英美烟公司的行径，钉上几尺见方的大字？这即使不说是忘国之相，总也不免表明北京人都是俗恶东西，不知道美丑是非的。平时在墙上乱贴的招贴，也几乎无不讨厌，实在应该全都洗去，还得把那些招贴的主者分别押禁“自新所”才对。我并不希望行共产或王政，只想北京的市政能够弄好一点，拿枪的强盗减少，马路修平，卫生设备改善，史迹保存，此外那些可厌的牌号字帖都除去，这就好了。<sup>9)</sup>

周作人在这里所讲的是，首都市政的糟糕和北京人对审美意识的缺乏；我们读一读周作人的回忆录，其实他对北京城市道路的总体记忆并不美好。“交通不便，许多地方不能通行，须要绕一个大圈子”，道路难走，每到雨季，胡同就变成“泥水一滩”<sup>10)</sup>；道路破坏也很脏，“沟内满是垃圾以及居民所倾倒出来的煤球灰”，认为“一副没人管理的北方的景象”。<sup>11)</sup>而让他最为感到困惑的是，每次经过历史古迹时，时时刻刻被换起来的对那些残酷的历史阴影和城市记忆，即古老帝国国都的记忆：他经过菜市口这个明清时代著名的杀人场时，不免就想起在此处“庚子时候杀三大臣，戊戌的杀五君子的”的记忆来<sup>12)</sup>；经过东安门，他发现的是当年夏辟时张勋的辫子所兵打出来的枪弹的痕迹<sup>13)</sup>；在西四牌楼上，也想到了明朝的统治者用它为“杀人示众之处”的残酷历史<sup>14)</sup>；而经过故宫的后门神武门时，他所看到的却是“宣统在退位之后还保留皇帝称号”，“便在这里边设立小朝廷，依旧每天上朝”，甚至“一辆驴子拉的水车，车上盖着黄布”，仍“每天往玉泉山取水，来供给御用的”的奇怪的场面。<sup>15)</sup>周作人说这是

8) 周作人《拆墙》，《谈虎集》，pp.165-166.

9) 周作人《天安门》，《周作人集外文1926-1948》，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p.202.

10) 周作人《往来的路（111）》，《知堂回想录》，p.365.

11) 周作人《道路的记忆（168）》，《知堂回想录》，p.601.

12) 周作人《道路的记忆（167）》，《知堂回想录》，p.595.

13) 周作人《道路的记忆（168）》，《知堂回想录》，p.600.

14) 周作人《道路的记忆（167）》，《知堂回想录》，pp.595-596.

15) 周作人《往来的路（111）》，《知堂回想录》，p.365.

在别的地方难得看见的东西，在挖苦的语调中，能够感受到一种说不出的辛酸和悲哀。

周作人对北京的这种态度，与他对待东京的态度一比较，就显得更加突出。他曾在东京留学6年。周作人对日本尤其是东京的感情很深。他一直说，把东京当作第二故乡，他对东京的感情远胜于曾住过的其他城市，如杭州、南京或北京。<sup>16)</sup>对于东京，尤其喜欢其在衣食住上的简练、朴素以及生活上的情趣，<sup>17)</sup>而他认为这恰恰是北京所缺少的。<sup>18)</sup>他在著名的《北京的茶食》这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讲：

北京建都已有五百余年之久，论理于衣食住方面应有多少精微的造就，但实际上似乎并不如此，即以茶食而论，就不曾知道什么特殊的有滋味的东西。固然我们对于北京情形不甚熟悉，只是随便撞进一家饽饽铺里去买一点来吃，但是就撞过的经验来说，总没有很好吃的点心买到过。难道北京竟是没有好的茶食，还是有而我们不知道呢？这也未必全是为贪口腹之欲，总觉得住在古老的京城里吃不到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北京的朋友们，能够告诉我两三家做得上好点心的饽饽铺么？<sup>19)</sup>

周作人感慨“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认为这是“现在中国生活”“极端地干燥粗鄙”的表现，其背后隐藏的是对于中国这个国度整个国民生活的干枯和缺乏情趣的遗憾。我们可以发现，周作人批评的其实不仅仅是北京本身，而更包括的是中国整个的国民生活的匮乏，在这里，北京被认为是国家或其国民生活的代表而提出来的。而将北京看作国家的代表这个想法本身，体现着一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常有的国民性视角。也就是说，周作人看北京的时候，其看重的主要并非北京本身的地方性，而是作为一个现代中国的首都所应该具有的品质和现实的处境。这与其说是“北京的（地方性）”，不如说是“中国的（国家性）”：他之所以批判北京的市政，是因为认为北京公共设施、市民意识、城市环境的落后代表整个中国在这个方面的全

16) 钱理群《周作人传》，p.316.

17) 周作人《怀东京》，《瓜豆集》，pp.60-69.

18) 周作人说：“我以为日本人古今不变的特性……一是现世思想，与中国是共同的，二是美之爱好，这似乎是中国所缺乏。”（《日本管窥》，《苦茶随笔》p.140.）

19) 周作人《北京的茶食》，《雨天的书》，p.51.

面落后；他之所以经常在北京的各个角落上引发出过去历史和现实政治的阴影，同样也是因为北京作为800年的古都象征着古代和现代中国的封建性和权力性，而其看待的标准，则典型的现代性的标准。

周作人阅读北京的这种方式，既区别于以老舍为代表的“老北京人”阅读北京的方式，也区别于他自己对待东京或故乡绍兴时的态度。老舍笔下的北京，注重的是其地方性和风土性，在语言、饮食、举子、风俗中具体可感，可吃、可体会的北京。周作人追忆东京和老家绍兴，尽管也不无犀利的解剖，可总体感觉还是比较温暖、体贴。可一旦他涉及到北京，尤其是涉及现实中的北京时，他的笔端总显得比较苛刻，理性分析多于情感认同，而这主要因为周作人并不将北京作为一个亲身认同的空间，而作为一个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对象并且以现代中国的国度来对待的基本态度有关。

### 三. 从民俗学的角度看北京

进入1930年代，周作人开始专门收集明清时代文人学者的笔记，其中也包括记录北京过去民俗风情的笔记。周作人历来喜欢这些记录平民日常生活和风俗、节日、人情的书，<sup>20)</sup>认为这些记录，对理解本国人民思想和情感生活非常有用，也是可靠的基础材料。他说：“假如另外对中国人的过去与将来颇为关心，便想请把史学的兴趣放到低的广的方面来，从读杂书的时候起离开了庙宇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渐与田夫野老相接触，从事于国民生活史的研究，虽是寂寞的学问，却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sup>21)</sup>可见，周作人收集、阅读有关这个方面的记录，有明确的目的，即为了“国民生活的研究”这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民俗学研究。<sup>22)</sup>周作人在这个时期收集、抄录过去北京日常生活和风土、习俗、节日的笔记，其动机基本上也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20) 周作人说：“我很喜欢讲风物的书，小时候在丛书里见到《南方草木状》、《岭表象异》、《北户象》等小册子，觉得很有兴味。”（《广东新语》，《苦竹杂记》，p.102.）

21) 周作人《风土志》，《立春以前》，p.143.

22) 关于周作人的民俗学研究和他的民间文学思想，请参考钱理群《民俗学研究与国民性考察》（《周作人论》，上海人民出版社，pp.166-195.）和陈永超《“个人主义与人间本位主义”：周作人的民间文学思想》（《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pp.63-103.）

他在《天桥志序》中说：

我欢喜次溪的《天桥志》，觉得它有意思，有意义，因为在那里表现出中国人民的生活。天桥这地方，在一般的人看来，是平民的各种货物与各种演艺的聚集处。这有如市集和庙会，却是天天在集会，永久存在，也时刻在变化。……我们如只为自己，要去买点东西，或享点娱乐，去过以后就算满足。但是假如退下一步，要想想那里卖的是些什么货色，表现的是什么技术，不是自己想怎么，乃是从货色和技艺来看大家的需要与享乐，这便于实地观察之外还需要记录的资料了。<sup>23)</sup>

天桥是北京天坛附近有名的民间游艺聚集地。从清代末期到民国，这里每天开各种各样的民间演出，同时也有了贩卖杂货的小商品市场，是京城平民百姓特别喜爱去的地方。《天桥志》是专门记录这个地方的书。分别记载天桥从发生到兴衰的历史以及其掌故、游乐、人物、曲艺、杂技、摊贩、吃食等各个方面。除此之外，我们在他的读书笔记中也能找到很多关于北京这个方面的书目：《燕京岁时记》、《帝京景物略》、《日下旧闻》、《一岁货声》、《藤阴杂记》、《旧京琐记》、《天咫偶闻》、《都门竹枝》、《都门杂咏》、《燕都竹枝词》等。《燕京岁时记》记录北京的岁时风俗、物产、技艺<sup>24)</sup>；《天咫偶闻》实录过去京城的地理<sup>25)</sup>；《一岁货声》是记录一年北京市上叫卖的各种语句和声音的<sup>26)</sup>；《都门竹枝》、《都门杂咏》、《燕都竹枝词》都是描述清代北京风俗的竹枝词。<sup>27)</sup>

周作人看重这种笔记，是因为从中能够感受到过去北京平民日常生活的风趣。他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抄录了大量的有关这些材料。如在《燕京岁时记》中，他抄录了该书里记载过去京城人民的丰富多样的娱乐游戏和物产的部分，“如一月中记《耍耗子耍猴儿耍苟利子跑旱船》，十月的《糟蟹良乡酒鸭儿广柿子山里红》，《风筝毽儿琉璃喇叭吹布登太平鼓空钟》，《蝓蝓儿聒聒儿油壶卢》，《梧桐交嘴儿顶儿老西儿燕巧儿》，《栗子白薯中果南糖萨齐玛芙蓉糕冰糖葫芦温朴》，《赤包儿斗姑娘海棠木瓜

23) 周作人《天桥志序》，《周作人文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pp.125-126.

24) 周作人《燕京岁时记》，《风雨谈》，pp.37-40.

25) 周作人《燕京岁时记》，《风雨谈》，p.40.

26) 周作人《一岁货声》，《夜读抄》，pp.54-57.

27) 周作人《北京的风俗诗》，《知堂乙酉文编》，pp.51-52.

馭朴各条”，认为“写得很有意思”。<sup>28)</sup>；又如在《一岁货声》中，抄录了一段行贩叫卖硬面、饽饽的声音——“硬面俺，饽阿饽……”，认为这很能表现出过去平民百姓在生活中的“悲凉”，说这种声音“在寒夜深更，常闻此种悲凉之声，令人恍然，有百感交集之概。”而从这些抄录的材料中，周作人对过去北京风俗和日常生活的总体感受，可以概括为一句“丰厚温润”。他说：

著者自序称可以辨乡味，知勤苦，纪风土，存节令，此言真实不虚，若更为补充一句，则当云可以察知民间生活之一斑，盖挑担推车设摊赶集的一切品物半系平民日用所必需，其闲食玩艺一部分亦多是一般妇孺的照顾，阔人们的享用那都在大铺子里，在这里是找不到一二的。我读这本小书，常常的感到北京生活的风趣，因为这是平民生活所以当然没有什么富丽，但是却也不寒伧，自有其一种丰厚温润的空气，只可惜现在的北平民穷财尽，即使不变成边塞也已经不能保存这书中的盛况了<sup>29)</sup>

不过，要注意，周作人抄录的这些东西大都是记录过去的，当代现实的很少，对于现在北京人民的日常生活，他的基本判断是：“现在的北平民穷财尽，即使不变成边塞也已经不能保存这书中的盛况了。”在前面已经说过，周作人对现实北京有很多不满，而其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代北京人民生活的枯燥无味和在整个城市审美意识的缺乏。他曾在北京的西四牌楼以南走过，望着老店异馥斋的丈许高的独木招牌，感到不比神往，因为那模糊阴暗的字迹让他引起一种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可这毕竟是过去的东西，现在的北京里已经很少有这样的风景，对此他感到非常遗憾，并且也批判了当时在北京泛滥的各种各样的“粗恶的模仿品”。<sup>30)</sup>而就是这种对现代北京生活的批判意识，触发了他对北京过去的风俗和日常生活的强烈兴趣。他在古籍堆里找出了一大批这个相关材料，从中挑选、挖掘并抄录了过去北京平民既生动又丰厚的生活的纪录。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周作人笔下的过去北京的风俗和日常生活，与其说历史的，不如说现实的，其实在其背后隐藏着很强的现实关怀，与在前面说的作为批评对象的现实北京正好回应。

28) 周作人《燕京岁时记》，《风雨谈》，p.39.

29) 周作人《一岁货声》，《夜读抄》，p.56.

30) 周作人《北京的茶食》，《雨天的书》，p.52.



#### 四. 作为文人生活的北京

周作人关注民间的风俗和日常生活，可这并不等于说他在自己的生活中也真正融入到民间里去。他对民间生活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人类学者的眼光、一个观察者的角度看的，而他自己的生活还是追求书斋里的优雅的文人生活。周作人曾经谈过什刹海，他说，这里在夏天兴起夏令市场，摆些茶摊、点心铺，又有说书、歌唱、技艺的场所，可以说平民百姓的游乐地，他经常路过这儿，可很遗憾从来没去过<sup>31)</sup>。而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城南边的厂甸。厂甸是琉璃厂附近一带的市集，每年阴历元旦至十五元宵节在这里开庙会，庙会里卖珠宝、古董、饮食、玩具等各种各样的杂货品，可这里吸引游客的主要还是在东西路旁摆着的是很多书摊。周作人在一篇叫《厂甸》的文章中，表白了对这个地方的喜爱以及在此购书的乐趣。

厂甸的路还是有那么远，但是在半个月中我去了四次，这与玄同半农诸公比较不免是小巫之尤，不过在我总是一年里的最高记录了。二月十四日是旧元旦，下午去看一次，十八十九廿五这三天又去，所走过的只是所谓书摊的东路西路，再加上土地祠，大约每走一转要花费三小时以上。所得的结果并不很好，原因是近年较大的书店都矜重起来，不来摆摊，摊上书少而价高，像我这样“爬螺蛳船”的渔人无可下网。然而也获得几册小书，觉得聊堪自慰。<sup>32)</sup>

去的路那么远，也不是路过，可在半个月中去了四次，其喜欢的程度可想而知。其实，何止是四次，周作人从1917年来北京以后每到春节，无不例外地跑去厂甸选书、购书，在平时也一有空闲就去厂甸、琉璃厂跑那一带的书店和书摊。这与什刹海相比，其喜爱的程度不可同日而语。显然，对于作为读书人的周作人，厂甸更适合于他自己。因为这里不仅有买旧书的方便，同时在这种书海淘金中也能感受到读书人以文会友的乐趣。在灰尘堆满的书摊上能够找到自己心意的旧书，简直如碰上知音一样高兴的事情。对周作人来说，这其实是一种寻找朋友、与古人对话的过程。另外，由于当时的厂甸，北京的文人都爱去的地方，所以在跑书摊的路上，也经常碰到友人，趁着机会去喝茶聊天。同时也偶尔在书摊上会碰到一些友人的痕迹。如周作人有一次

31) 周作人《道路的回忆 (167)》，《知堂回想录》，p.598.

32) 周作人《厂甸》，《夜读抄》，p.153.

去厂甸，在摊上发现清刻《读诗一得》，书上有钱玄同先人的手迹题跋，特意买来送给钱玄同，可以想想，其中所体现的文人生活的雅趣，着实令人羡慕。<sup>33)</sup>

周作人不喜欢作为政治符号的北京，也不满北京人的审美意识，可他却很喜欢作为文人生活的北京。这一点对周作人很重要。北京与其他中国城市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具有浓厚的学术气氛。这里有很多大学校园和研究机关，也有图书馆、书店和出版社等丰富的文化设施，而在这些学术硬件和5·4以来新旧学术结合的氛围中，这个城市体现着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特色。特别是在1928年之后，随着首都的搬迁，北京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变成“文化城”，而这种相对淡化的政治空气以及校园里优裕的生活环境，给这里的文人学士们，拥有了一种别个城市无法比拟的学术氛围。<sup>34)</sup>

周作人在当时住在北京八道湾十一号。这是周作人在1919年以来一直住来的北京的个人住宅。<sup>35)</sup>他将这里的书房叫做“苦雨斋”。当时在苦雨斋中有一批文人经常来往，如钱玄同、俞平伯、废名，刘半农、沈尹默、沈士远、沈兼士、江绍原等。他们本来以师生或同事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后来周作人为核心逐渐形成了一个文人集团。他们之间有共同的爱好、类似的趣味，在学术上也有共同的趋向。总体上来说，他们都喜欢古典，讲究一些传统士大夫式的文人情趣。苦雨斋实际上就是他们当时的文化沙龙。<sup>36)</sup>在1920年代后期，周作人宣布“闭户读书”。<sup>37)</sup>以后，他基本上沉浸在这所苦雨斋里，读书写作、会友谈天，在淡泊宁静的隐逸氛围中，尽情享受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园地”。而整个中国都陷入战争漩涡里的1930年代里，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空间。谢兴尧在1930年代中期曾访问过“苦雨斋”，对其情景这样描述：

周的住宅，我很欣赏，没有丝毫朱门大宅的气息，颇富野趣，特别是在夏天，地处偏僻，远离市廛，庭院寂静，高树蝉鸣，天气虽热，感觉清爽。进入室内，知堂总是递一纸扇，乃日本式的由竹丝编排，糊以棉纸，轻而适用，再递苦

33) 姜德明《厂甸，久违了》，《守望冷淡》，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34) 旷新年，《百年文学总系·1928革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p.243。

35) 这所北京八道湾11号原本由鲁迅买的。鲁迅是1912年来北京，先住在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直到1919年7月，他买下了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的旧住宅。同年底，鲁迅的母亲、朱安夫人、及周作人、周建人的全家陆续搬至于此。可1923年8月，鲁迅和周作人失和，搬出了八道湾，从此周作人成为八道湾的主人。（孙郁《周作人与他的苦雨斋》，人民文学出版社，p.1.）

36) 孙郁《周作人与他的苦雨斋》，pp.1-16.

37) 周作人《闭户读书论》，《永明集》，pp.113-115.

茶一杯，消暑解渴，确实隐士清谈之所，绝非庸俗扰攘之地。<sup>38)</sup>

在这样寂静清爽之氛围中，读书写作、与好友喝茶谈天，这简直是世外桃源。怪不得，1949年，因汉奸罪入狱三年的周作人，终于被保释出狱，据说当时胡适等人要请他去台湾或香港，<sup>39)</sup>可他还是执意要回到北京的苦雨斋。入狱期间神往苦雨斋的心情，由此可见一斑。在前面引过的郑振铎的话，或许正是提到了这一点，就是七七事变之后，周作人留在北平，固然会有更复杂的原因，而至少也可以认为，以苦雨斋为代表的这种北京的文人生活情趣对当时周作人的决定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文人生活的角度看北京，周作人描写北京的笔法也有所变化。进入1930年代，周作人对于北京的现实不再做严厉的理性批判，而主要抄录过去风俗的同时，偶尔也对北京做抒情化的表述。如在《北平的春天》中，周作人描写北京的春天：他不喜欢北京的春天，因为北京的水汽太少，不滋润，春天也来得太慌张，尽管背后也不无批评北京文化的意涵，可表现出的基本上是对北京天气这一自然现象的纯粹个人感受。<sup>40)</sup>而这种变化就告诉我们，周作人心目中的北京逐渐从过去的理性分析转移到情感体会，其表现的对象也从过去的市政和公共空间转移到个人世界里的城市感受。

1949年，周作人重新回到自己向往的苦雨斋，尽管这时的苦雨斋已经与自己以往的苦雨斋有很大的不同，可他仍然在这寓所照旧读书、翻译、写作，一直到1967年去世。周作人在这里生活了将近45年，可以说它伴随着周作人的一生。理解周作人，我们不可忽略它的存在，其实，它以更加生活化的方式给我们展示作为生活人的周作人，一个文人的周作人。

38) 谢兴尧《回忆知堂》，刘绪源编《苦雨斋主：名人笔下的周作人 周作人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8，p.101.

39) 1949年7月28日，上海的《亦报》上发表了一篇未署名文章，题为《胡适之硬劝周作人》，文中说：“胡适之这次去美国甘心为蒋贼吹牛之前，曾经小住上海。知道周作人出狱居沪，就叫人约周往谈，但为周所拒，后来又约在彼此认识的某君家里吃饭，周仍婉辞。…后来胡适又托人坚劝周作人南下，力保无论到香港去台湾，一定有教授位置。周却对来人笑谢，说我当年苦主北平，曾以苏武自况，这次倘离上海，难道自居白俄，还是自称政治垃圾？8月11日，《亦报》也发表了一篇题为《周作人决定北归》文章，署名迟红说：“伪府将垮，胡适朱家骅等曾邀之南下，许以教授席，拒不住，闲居门生尤某沪寓。…知堂虽南人而久视北平为第二故乡，交游妻子望之久矣，其浩然有归志也”（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p.732，p.734.）

40) 周作人《北平的春天》，《风雨谈》，pp.144-147.

## 五. 小結

正如他自己说,对周作人来说,1917年来定住北京,是人生的一大转折。<sup>41)</sup>从此,他进入北大、燕大等高校去教书,并且开始发表大量的散文,成为学界的名人和新文学的著名作家。他在这里亲眼目睹了张勋复辟、五四、三·一八等一些列重大政治事件,也亲自参与了文学革命、“信教自由”风波,北京女师大事件等事件,从而在北京的思想文化界留下了很大的影响。不过,1937年那一次不离开北京的选择,却又决定了周作人后半辈子的命运和世人对他的总体评价。随后他陷入深渊,担任日治下的伪华北政府教育总署督办,竟成为背叛国家的汉奸。这样,北京对周作人来说既荣誉也是耻辱的空间,可1949年当他重新回到北京的时候,以“苦雨斋”为代表的北京对他又成为一处心灵的庇护所。

在1920代,周作人刚去北京的时候,主要从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眼光看北京,批评首都的市政和市民意识包括审美意识。到了1930年代,他又从民俗学的角度,关注过去北京的风俗,抄录过去文献中关于北京人民的日常生活和风俗的记录。这两者在表现的对象不同,可实际上是在同一个问题意识上出发的,即对以北京为首的整个中国在现代城市建设进程上的落后以及现实北京生活的枯燥无味和缺乏审美情趣的批判意识。相对来说,更值得重视的是,周作人在个人生活中的北京。尽管他从来不直接说自己的日常生活,可在友人的回忆和周作人本人的一些细节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对北京文人生活的喜爱。他欣赏相对宁静的北京的学术氛围,更欣赏自己与“苦雨斋”在一起的一切记忆。而正是周作人对北京文人生活的这种特殊的喜爱,从某种程度上,成为他在1937年终于决定不离开北京的内在心理动因之一。

41) 周作人《去乡的途中之二 (105)》:我此次北行,仿佛是一个大转折,过去在南京时代很有关系的椒生公和从小就是同学似的伯升,适值都在这个时期过去了,似乎在表示时间的一个段落吧。(收于《知堂回想录》, p.345.)

《参考文献》

- 止庵 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 陈子善、张铁荣 编《周作人集外文1926-1948》,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
- 钟叔河 编《知堂书话(上,下)》,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 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
- 止庵《周作人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 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 孙郁《周作人与他的苦雨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 舒笑《周作人的是非功过》,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 木山英雄《北京苦主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 刘绪源编《苦雨斋主:名人笔下的周作人周作人笔下的名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 刘如溪编《周作人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 孔庆东编《自己的园地:关于周作人》,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 陈平原、王德威 编《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旷新年,《百年文学总系·1928革命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 洪烛《周作人与北京》,《中国工人》,2000年 第8期.

《국문제요》

周作人에게 있어 1917년 베이징으로의 이주는 그의 인생에서 결정적인 전기였다. 이로 부터 그는 베이징대학 등을 근거지로 수많은 산문을 발표하면서 저명한 학자이자 신문학 작가로 명성을 날리기 시작했다. 베이징에서 그는 復辟 5·4, 3·18과 같은 수많은 정치적 사건들을 경험하였고, 文學革命과 '종교자유선언', 그리고 北京女子師範大學 사건과 같은 굵직한 사안에 직접 참여하기도 하면서 베이징의 사상계와 문화계에 영향력 있는 인물로 성장하였다. 그러나 1937년 일본군의 전면적인 침략에도 불구하고 다른 문화계 인사들과 달리 남하하지 않고 베이징에 남을 것을 결정하면서 그의 후반기 인생은 새로운 국면으로 접어들었다. 이후 그는 베이징을 점령한 괴뢰정부에 동조하는 행보를 보이다 결국 일본 치하

화북정권의 교육총서독판이 되었다. 이렇게 周作人에게 있어 베이징은 자신의 명성을 가져다 준 영광의 공간이자 동시에 친일파란 일생일대의 오점을 남긴 치욕의 공간이기도 하다.

1920년대 周作人은 주로 사회비평과 문화비평의 관점으로 베이징을 바라보면서 수도로서의 베이징의 시정과 공공시설, 시민의식의 미비 등에 대해 비판하였다. 1930년대에 와서는 주로 민속학적 시각으로부터 과거 북경의 풍속에 주목하면서 고대 문헌 속에 기록된 베이징 사람들의 일상생활과 풍속을 채록하였다. 192,30년대 베이징에 대한 周作人의 이러한 인식은 일견 서로 달라 보이지만 사실상 동일한 문제의식으로부터 출발한 것이다. 그것은 바로 베이징으로 대표되는 중국의 도시 건설이나 시민의식, 심미의식 등이 대단히 낙후해 있다는 상황에 대한 비판적 인식이다. 따라서 한편으로 현실 베이징의 다양한 문제에 대해 비판하면서 다른 한편으로는 과거 베이징인들의 생동감 있고 풍부한 풍속과 일상생활의 기록을 복원함으로써 현실을 극복하는 방안을 제시하고자 한 것이었다.

192,30년대의 베이징에 대한 인식이 주로 이성적 차원에서의 접근이었다면 보다 감성적인 차원에서 자신의 경험을 통한 베이징에의 접근은 일종의 문인 생활로서의 베이징에 대한 향유라고 할 수 있다. 비록 周作人은 자신의 일상생활에 대해 직접적으로 언급을 한 경우가 거의 없었지만 주변인들의 회고나 그의 생활에 대한 일련의 일화들 속에서 우리는 문인으로서 周作人이 베이징에서 생활하는데 대해 상당한 만족감과 안온함을 느끼고 있었음을 발견하게 된다. 그는 베이징의 오랜 학술적 분위기와 함께 전란 속에서도 상대적으로 평온함을 유지할 수 있었던 베이징의 고아함을 좋아하였고, 특히 자신의 저택인 ‘苦雨齋’와 함께 했던 여러 친구들과의 시간과 서재의 안온함과 평화를 잊지 못하였다. 1937년 周作人이 베이징을 떠나지 못한 데는 물론 보다 근본적인 이유가 있었겠지만 ‘苦雨齋’로 대표되는 이러한 자신만의 공간을 차마 버리고자 하지 않았던데도 적지 않은 내재적 요인이 있었다고 볼 수 있다.

**關鍵詞** : 周作人, 北京, 文化批評, 社會批評, 風俗, 民俗學, 文人生活, 文化記憶

이 논문은 2009년 11월 11일에 접수되어 2009년 12월 11일에 심사가 완료되고 2009년 12월 15일 편집회의에서 게재가 확정되었음.